

略論中國現代文學 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影響

——以中國文化/文藝運動的跨國影響為考察視閥*

郭惠芬

[提要] 中國現代文學對東南亞華文文學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1919年以來，伴隨著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跨國傳播，東南亞華文文學實現了從舊文學向新文學的現代轉型。此後，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與抗戰文藝運動的傳播下，東南亞華文文學的主題內容、創作模式、表現形式等進一步受到中國現代文學的深刻影響，並逐漸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學傳統”。而中國現代文化/文藝運動在東南亞的跨國傳播和影響，也顯示出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漢語/華文文學相互交流的重要性的必要性。

[關鍵詞] 中國現代文學 東南亞華文文學 中國現代文化/文藝運動 傳播與影響

[中圖分類號]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4) 01 - 0071 - 11

引言

從東南亞華文文學發展史來看，東南亞華文文學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的滋養和影響。著名的美籍華人學者周策縱教授於1988年在新加坡舉辦的“第二屆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上致“總結辭”時，即特意強調“中國文學傳統”對於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重要性：

任何有成就的文學都有它的歷史淵源，現代文學也必然有它的文學傳統。大家都知道，中國本土的文學，自先秦的經典發展下來，自有一個完整的文學傳統，……（東南亞）地區的華文作家，自然不能拋棄從先秦發展下來的那個“中國文學傳統”（Chinese

* 本文係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中國—東南亞文學交流史”（項目號11YJA751016）的階段性成果。

literary tradition)。沒有這個根源，東南亞以至其他海外華文文學，便象無根無干的樹枝，開不了花，結不了果。^①

對於東南亞華文文學而言，“中國文學傳統”包括先秦發展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不過由於論題所限，本文只關注中國現代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之間的關係，尤其著重於中國現代文學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影響研究。而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文化/文藝運動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影響也極為深遠，因此本文擬以中國現代文化/文藝運動跨國影響的視閥，簡要論述中國現代文學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影響，並由此總結中國與東南亞漢語/華文文學相互交流的價值和意義。

一、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影響

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開啟了中國現代新文學史，而且跨越國界傳播和擴散到東南亞，從而催生和哺育了東南亞華文新文學。

在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傳播到東南亞之前，東南亞華文報章刊登的文學作品大多是文言散文、傳統小說和舊體詩詞，而這種舊文學和舊形式是無法適合華人移民群體特殊的國家認同、社會地位、心理狀態和文化要求的。到了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化運動及文學革命運動蓬勃起來了”，“這正是他們所需要的一種新思想新文化運動，正是最適合於他們的一種表情達意的文學形式與文字工具”，“於是他們也起而響應，搞起新文學來”。^②正是由於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跨國傳播，東南亞華文文壇才實現了文學的現代轉型。

在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跨界傳播中發揮最大作用的是東南亞華文報章編輯。五四時期的東南亞華文報章編輯基本上是從中國南下的知識分子，他們對中國有著強烈的認同感，與中國的新聞出版界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的情況也十分敏感和關注，因而也最先感受到中國文化思想界正在發生的重大變革，以及這場變革對於整個中國乃至東南亞華人社會可能具有的深遠意義。因此，這些充滿社會意識和政治使命感的報章編輯在遠離中國的東南亞對這場文化思想大變革給予了積極的回應，其中新加坡《國民日報》和吉隆坡《益群報》的編輯成為東南亞傳播五四新文化的急先鋒。1919年五六月間，上述兩份華文報章編輯有的表示要在新馬掀起“南洋文學界的革命”^③，有的宣佈只發表“新文藝”作品，不再刊登“詩詞頌箴”舊文學，^④有的宣佈該刊“悉以容納世界最新思潮、最新學說”^⑤。他們還在報章副刊上創設“新小說”、“新文藝”、“新劇”等新文學欄位，並大量刊載中國五四新文學作家的作品。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初幾年間，東南亞華文報章大量引介和傳播中國五四作家創作的白話新詩、小說、戲劇、散文等，其中有五四新文學名家以及其他作者如胡適、郭沫若、周作人、葉紹鈞、楊振聲、劉大白、冰心、鄭振鐸、王統照、劉延陵、傅斯年、成仿吾等人的作品。這些以白話文創作的文學大多充滿五四時代精神，如強烈的社會憂患意識，關懷平民疾苦，歌頌勞工神聖，反對封建倫理觀念，追求男女平權，主張婚姻自主，張揚個性等。這類具備新精神和新形式的五四新文學作品，為東南亞華文新文學的產生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範式作用。

（一）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影響

在五四新文學的哺育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文壇上出現了白話新詩、新小說、新戲劇、新散文等新型的文學樣式，由此開啟了新馬華文新文學的創作實績。如赤光的《小詩十首》就是受中國小詩影響而產生的哲理小詩，其中寫道：“憂愁是快樂的種子，/快樂的人生，/從憂愁中得來

的。”^⑥秋毫的《南洋勵志歌》也是在中國取法民歌的風潮影響下產生的民歌體詩：“南洋地，不易居。論人事，薄如紙。要久住，宜立志。戒嫖妓，絕賭癡。勿看戲，不坐車。毋荒嬉，不浪費。勤學藝，多讀書。敦友誼，慎言語。”^⑦新馬華文“問題小說”同樣深受中國五四新小說的影響，如雙雙的《洞房的新感想》、雪樵的《屈服》表現南洋華人知識青年在新思想與舊勢力、自由戀愛與經濟壓迫之間的矛盾和彷徨；林獨步的系列小說《笑一笑》、《兩青年》、《同窗會》通過三個相互關聯的故事闡釋了作者對戀愛、婚姻、家庭以及兩性關係的正向看法，如男女雙方在經濟與社會生活方面都應享有平等地位，婚姻和家庭應該建立在自由戀愛的基礎上等等，這都顯示了五四時代精神對新馬華文問題小說的深刻影響。而瞿桓的《瘋人日記》在篇名、人物、題材、主題、結構、形式等方面明顯模仿和借鑒魯迅的《狂人日記》，小說以“瘋人”的獨特眼光和病態心理觀察、感受敘述者與校方、同學、好友、戀人的相處情形，在“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敘事中隱含著作者對舊教育體制及封建禮教的批判，以及在新舊交替的時代轉型中五四新青年的迷茫與彷徨。

（二）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泰國華文文學的影響

五四時期，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中國文化人南下泰國，將五四新文化傳播到泰國華人社會，泰國華文新文學也開始產生和發展。當時由林銘三主持的泰華日報《暹京日報》文藝副刊《文苑》所刊登的一些小說、散文、詩歌即以白話文創作。另一份泰華日報《中華民報》常轉載中國五四新文學作家的作品，如許地山的短篇小說《命命鳥》、洪深的白話戲劇《趙閻王》等。該刊也常發表泰華學生的作品，其中有子才的小說《拉夫歌聲》、無意的潮劇《雙戀影》、無心的新詩《愛神》和《昨夜的夢》、散文《愛神和饑鬼》、良工的小說《故鄉帶來的禮物》等。^⑧由於五四時期的泰華作者大多為中國第一代移民，因而其作品較為關注和反映中國社會現實，如子才的《拉夫歌聲》反映了中國軍閥強行拉夫當兵的殘酷現實，良工的《故鄉帶來的禮物》敘述家鄉的土匪擄人贖錢的事實。這種關懷現實人生和底層民眾的寫實主義態度和人道主義精神，與中國五四新文學的影響分不開，而無心的《愛神》與五四新文學追求婚戀自由的時代潮流也有直接的關係。

（三）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緬甸華文文學的影響

在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學的影響下，當時應聘到緬甸仰光擔任《覺民日報》編輯的中國南下文人聶紺弩對仰光“天南詩社”舊詩人每週課題徵詠詩鐘的落伍行為大加抨擊，使緬華讀者和作者認識到“死文學”嚴重脫離社會現實的虛偽與矯飾。

另一份緬華報章《仰光日報》副刊《波光》的編者雲半樓也利用所訂的中國報刊雜誌，剪下許多中國五四新文學作品和學術論文來充實該刊版面。《波光》還登載緬華作者創作的白話新詩和散文，如該刊編輯寫的《病中日記》等。另一位南下緬甸的中國文人艾蕪也由於《仰光日報》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緣故，而於1928年為該刊投寄散文和詩歌。此外，受到中國五四新文化影響而成長起來的緬華僑生作者黃綽卿也在該刊上發表了《棄婦》、《一個賣火柴童子的故事》、《濟南城中的血淚》、《小鐵匠的生活》等新文學作品。^⑨

（四）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菲律賓華文文學的影響

在五四新文化的影響下，菲律賓華文報刊《平民週刊》不遺餘力地鼓吹五四新文化與新思想。^⑩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接受五四新文化影響而後南下菲律賓的藍天民在當地創辦了文藝副刊《新潮》，並組織菲華文藝青年團體“新生社”，大力提倡新思潮與新文學。此外，菲律賓華人在當地也可以閱讀到胡適的《嘗試集》、魯迅的《阿Q正傳》、徐志摩的《志摩的詩》、老舍

的《貓城記》以及中國新文學期刊《文學》、《文學季刊》、《水星》等。^⑪這些源源不斷流入菲華社會的中國新文學書刊成為菲華作者學習和仿效的對象，並對菲華新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如30年代的非華文藝刊物《洪濤三日刊》和《海風旬刊》都出現了內容和文體形式明顯帶有中國新文學痕跡的非華文藝作品。^⑫

（五）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印尼華文文學的影響

五四時期，印尼華人創辦的華文報《新報》、《天聲日報》、《南洋日報》等文藝副刊一方面轉載和引介中國新文學作品，另一方面發表當地華文作者的創作。《新報》副刊《小新報》的作者們起而仿效胡適、魯迅的新文學作品，其中謝左舜的雜文，吳直由、阿五的白話小說，李瓊瑤、莆風的新詩都受到讀者的歡迎。《天聲日報》和《南洋日報》等創設的副刊也發表了印華作者受五四新文化影響而創作的白話新文學作品。^⑬

印尼華人還通過回母國升學的途徑而近距離地接受中國新文學的影響，如負笈上海暨南大學的印華作者鄭吐飛於1929年6月在上海真善美書局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椰子集》。此外，上海暨南大學邦加華僑學生會於1929年11月編印出版的《邦加》文集中也刊登了不少印尼留滬僑生創作的文藝作品，如《留美雜感》、《文藝與我》、《結婚與生活問題》、《遊檀仙山》、《蘇州旅遊漫記》、《廚子的貓》等短文。^⑭這些都是印華新文學在20世紀20年代的收穫，它們從內容到形式都受益於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開創的中國新文學的影響。

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影響

20世紀20年代末，中國新文學經歷了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巨大轉變。至1930年3月，伴隨著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的成立，以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代表的左翼文學佔據了30年代中國文壇的主流地位。

在此時期，一些中國共產黨人和左翼知識分子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清黨而南下東南亞避難，他們在為東南亞民族的解放事業從事政治鬥爭的同時，也在當地從事革命文學理論的傳播和創作實踐活動，由此催生出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盛行一時的南洋新興文學運動。

從南下新馬的中國革命作家馬寧於1932年7月發表在中國左翼作家丁玲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上的通訊《英屬馬來亞的藝術界》，可以見出這時期中國南下作者與東南亞新興文學（革命文學）運動的關係：

自中國國民黨清黨以後，革命的亡命客源源而來，而其中大部分是知識階級。而他們就在馬來亞創造了大宗的革命文學理論與創作。一九二八年起到一九三〇年之間是馬來亞華僑文壇狂風暴雨的時期，在這時期出現的作品我敢說決不比中國文壇的收穫為壞。第一，馬來亞是一個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和中國不同。（中國自然也是糟透；但馬來亞自有特殊的背景。）第二，大部分是流亡客之作，他們在中國本來又不是既成作家，來馬來亞後又受盡失業的艱苦和當地政府的壓迫，所以每一篇作品都是地底的呼聲。大部分都是描寫流浪生活，工人經濟鬥爭（帶政治意味的），失業工人的掙扎等等，這般作者都是政治工作者，革命學生，商店書記，流落在馬來亞的“弄幫”者（馬來語，是寄人家裡，白食白住的落難人的意思，是馬來亞最普遍的一種名稱。——原注）等等。最能夠容納這般作品刊登的刊物要算新加坡叻報的文藝副刊《椰林》，投稿的範圍非常廣，除了馬來亞外，荷領東印度，暹羅，印度，安南也在內。^⑮

馬寧的上述描述說明了如下幾個重要問題：一是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中國“革命的亡命客”源源不斷地流亡到英屬馬來亞（包括現在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當地創造了“大宗的革命文學理論與創作”，促進了南洋新興文學運動的潮流；二是這些流亡東南亞的“政治工作者”、“革命學生”、“商店書記”南渡前並非文學作者，但由於在東南亞受盡失業的痛苦與殖民地政府的壓迫，因而忍不住通過文學創作來反映他們的流浪生活及當地工人的政治經濟鬥爭，他們的身上實際上彙集了革命者與文學作者的雙重身份，因此其創作活動具有明顯的親歷性與政治功利色彩；三是這類反映同情與反抗意識的革命文學作品除了來自新馬作者外，還有荷領東印度（印尼）、暹羅（泰國）、安南（越南）、印度等地的作者，顯示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東南亞及周邊地區傳播的廣度。

（一）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影響

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影響下，新馬華文文壇出現了一大批反映新興意識的文學作品，其主題內容、創作模式、表現方式等均受到中國革命文學的深刻影響。

與中國革命文學一樣，新馬新興文學也著力表現“同情”與“反抗”的創作主題，作者或對底層民眾的悲慘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或對印度人、馬來人等弱勢民族被殖民與被壓迫的命運表示深切的哀憫，或反映新馬底層婦女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命運，或強調被壓迫與被剝削者的反抗精神，如靜倩（馬寧）的戲劇《女招待的悲哀》寫一位從中國流落到南洋的女青年李英因不願屈服於咖啡店老闆王小天和闊少胡鍾的淫威，最終與戀人白湖一起被誣陷入獄；曾華丁的小說《五兄弟墓》反映了荷屬東印度煙葉種植園裡的中國“豬仔”（指簽署賣身契約的華人勞工）“爬蟲”般的悲慘生活，以及他們聯合起來刺殺種植園管理者的反抗精神。

由於中國革命文學“革命加戀愛”創作模式的影響，新馬新興文學也出現“革命加戀愛”式的文學作品，它們有的強調革命與戀愛相對立的論調，有的盛讚無產階級戀愛主人公“戰鬥的力的美”以及正直勤勞的品性，如楊贊的詩歌《給談戀愛的青年》、林雪棠的小說《一個女性》、晨光的詩歌《你能愛我嗎？姑娘！》等，其中楊贊的《給談戀愛的青年》就認為青年男女的愛情與“革命的時代”格格不入，呼籲“有為的青年”儘快棄絕男女情愛：“可愛的有為的青年呵！/你當快快醒吧，/現在不是談戀愛的時期了；/正是革命的時代啊！/快把你底情琴毀敗了吧！/休彈你底戀歌。”^⑥

雖然中國革命文學功利性的文學觀及某些僵化刻板的創作模式對新馬新興文學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然而從總體上來看，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新馬新興文學運動與當時盛行的南洋色彩文學潮流相結合，共同創造了新馬華文新文學史上的第一個創作高峰期。

（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對緬甸華文文學的影響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和進步知識分子南下緬甸，其中包括林環島、吳景新和留學中國的緬甸僑生朱碧泉等人。他們有的在緬甸傳播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思潮，有的與其他緬華作者組織文學團體、創辦文藝刊物，使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緬華文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1928年，湯道耕（艾蕪）從中國南下緬甸，在當地參加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緬甸共產主義小組。艾蕪與林環島協助《緬甸新報》撰述文章，其發表的言論揭露了蔣介石國民黨出賣革命和屠殺民眾的罪行。1930年，蔣光慈的革命長篇小說《沖出雲圍的月亮》出版，緬華作者黃綽卿根據

艾蕪關於此書的意見寫成《沖出雲圍的月亮讀後》一文，發表在緬華《興商日報》副刊《方響》上。

1931年1月，艾蕪、林環島等人被英殖民當局逮捕入獄，但他們在獄中繼續以筆桿進行戰鬥，林環島的《入獄記》、《籠中雜感》和艾蕪的《獄中雜感》、《無冠帝王讚》、《兩個女人》（短劇）仍在緬華報章《新芽小日報》副刊《血花》上發表。被英殖民當局驅逐出境後，艾蕪前往上海，在左聯領導下從事文藝工作。1933年，艾蕪在《文學》、《現代》雜誌上發表《咆哮的許家屯》、《歐洲的風》、《南國之夜》等作品，這些作品也都流傳到緬華文藝界。

1933年，緬華文藝作者在朱碧泉的指導下成立“椰風文藝社”，並借用《仰光日報》副刊版位出版《椰風》週刊。椰風社與馬來亞左翼文壇有著密切的聯繫，為此響應馬來亞文壇的號召，開展“此時此地的文藝”運動，其作品內容注重反映地方現實，以文藝為政治鬥爭的武器，倡導緬華文化界建立統一戰線，鼓勵研究緬甸文學。

在椰風社的影響和帶動下，許多愛好文藝的緬華青年也創辦起各種文藝社團如“芭雨”、“十日談”、“黎明”等，並在緬華報章上創辦文藝副刊，有《興商日報》的《野草》、《芭雨》，《覺民日報》的《十日談》、《黎明》和《學生半月刊》等。

1934年，中國左翼文壇開展大眾語文運動，推行中國文字拉丁化，進而發動救亡運動的工作。緬華文藝工作者時刻反映中國的文壇動態，緊密跟隨中國左翼文學潮流，學習和研究拉丁化新文字和世界語，推行大眾語文學，介紹上海進步作家作品。他們把《椰風》週刊和《卜間》旬刊的刊頭畫加上拉丁化拼音，寫成“Jefung Zhoukan”和“Bugian Synkan”，並用拉丁化新文字通信。^⑦

（三）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對泰國華文文學的影響

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潮汕地區的一些中國共產黨人和左翼知識分子流亡到泰國，隨後在當地興辦學校、編輯報刊，傳播中國五四新文學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促進了泰華新文學的成長。

在此期間，泰華文壇還引進介紹了上海“左聯”、“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聯盟”以及艾思奇、魯迅、巴金、高爾基等左翼進步作家的哲學或文學作品。^⑧

此外應該提及的是中國革命作家洪靈菲與泰國的關係。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洪靈菲從廣東南下香港、新加坡、泰國等地避難。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後，洪靈菲與另一位流亡泰國的中國革命作家戴平萬一起回國，在上海組織“我們社”，創辦《我們》月刊，積極從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活動。洪靈菲回國後創作了帶有自傳色彩的革命小說《流亡》、《在木筏上》，其中描述了作者流亡泰國時的見聞和感受，有湄南河美麗的熱帶風光，以及華人移民黑米叔、亞木、妹子等工農形象。作者一方面同情泰國華人的苦難命運，另一方面展現了他們勇敢樂觀的生活態度。

（四）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對印尼華文文學的影響

從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開始，上海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重鎮。當時在上海暨南大學讀書的印尼華僑學生鄭吐飛於1928~1929年在《秋野》月刊上發表了《橡園之玫瑰》、《你往何處去》、《禁食節》等同情東南亞底層人民不幸命運的小說。《橡園之玫瑰》與《你往何處去》揭露了荷蘭殖民者勾結閩粵官匪誘騙中國人賣身到印尼充當苦力的罪行，以及種植園工頭對中國勞工令人髮指的虐待和管理方式。《禁食節》描述了印尼土著民族莫哈默德阿里一家的

苦難生活：泥水匠阿里在工作時摔斷了腿，一家人無米下炊，妻子西里只得哄騙兩個嗷嗷待哺的兒子，說今天是伊斯蘭教的禁食節。上述作品與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同情底層民眾的主題是相一致的，不過作者在悲憫東南亞底層民眾的苦難生活時，並沒有如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那樣為人們“指出一條改造社會的新途徑”。

此外，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印尼，愛好文藝的青年學生及文化界知識分子也可以閱讀到從地下渠道引進的中國左聯刊物《拓荒者》，以及左翼作家魯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而中國革命文學的傳播也促進了印華青年的文學創作。^⑩

三、中國抗戰文藝運動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影響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文藝界興起以宣傳民族救亡和抗擊日本侵略為中心內容的抗戰文藝運動，文藝工作者也紛紛投入抗戰救亡的實際工作或文藝運動中。為了建立文化界的抗日統一戰線，“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於1938年3月在武漢成立。“文協”在全國組織了數十個分會及通訊處，並提出“文章入伍、文章下鄉”的口號，還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創辦會刊《抗戰文藝》等。“文協”的成立，促進了中國文藝工作者的團結，也極大地推動了抗戰文藝運動的發展。

中日戰爭時期，東南亞華文作者大多數為第一代中國移民，華人知識分子傳統的憂患意識使他們極為擔憂故國的存亡與民族的命運。在中國抗戰救亡運動與抗戰文藝運動的影響下，他們紛紛表示要以文學宣傳配合中國的抗戰救亡運動，如新馬作者譚庭裕在《抗戰時期南洋文藝運動》^⑪中表示：

南洋的僑胞雖然受不到“飛機大炮的轟炸”，然而他們與中國的存亡，實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南洋的華僑也要同樣地去爭取民族的自由獨立解放。南洋的文運，不用說也要配合著中國的抗戰去發展的。

譚庭裕在文中對南洋文藝運動成績的展示，則進一步說明中國抗戰文藝運動對東南亞抗戰救亡文學的深刻影響：

回憶“七七”蘆溝橋事變以後，南洋的文藝運動，的確是能夠跟著中國民族自由解放的抗戰，做其救亡工作，在各報的副刊上，常發現許多短小精悍的“詩歌”、“速寫”和“報告”之類的抗戰文學，尤其是“救亡戲劇”來得更熱烈，如《父與子》、《在病室裡》、《為國犧牲》、《怒濤》、《罪犯》……等劇本的產生，這是抗戰以來，南洋的文藝界的“偉大收穫”。至於理論方面，也很能抓住問題的核心。像關於“馬華救亡統一戰線”的問題，各報都有討論過，……和各報的對文藝利用“舊形式”和“詩歌朗誦”……的注意，確是南洋文運很好的成績。

在中國抗戰救亡運動及抗戰文藝運動的傳播和影響下，東南亞華人社會掀起支援中國抗戰救亡的熱潮，東南亞華文抗戰救亡文學也得到蓬勃的發展。

（一）中國抗戰文藝運動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影響

在新馬抗戰救亡文學運動中，新馬文藝工作者十分重視文藝的宣傳和教育作用，他們圍繞著如何使文藝更好地為抗戰救亡服務而深入探討各種文學課題，如抗戰文學理論、文學的通俗化與大眾化、文藝通訊運動等，而這些文學理論又與中國抗戰文藝運動的影響分不開。

另一方面，新馬抗戰救亡文學緊密圍繞著抗戰救亡的創作主題，多方面地展現中國人民的反

侵略精神和新馬華人支援祖國抗戰的熱情，其中有關懷遭受日軍鐵蹄蹂躪的祖國，有展示中國人民反侵略的精神，也有反映新馬人民的抗戰救亡運動，如丁倩的小說《一個日本女間諜》以細膩深刻的筆觸，表現抗日志士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投身於隱蔽戰線的工作，為此不惜犧牲家庭和個人幸福，甚至奉獻出自己的生命；老蕾的小說《新生》敘述南洋商人偉民財迷心竅，替敵人招募開礦的華工，並為敵人散佈謠言，後被鋤奸團割去耳朵，在血的教訓面前才醒悟到自己所鑄下的大錯；乳嬰的小說《姊弟倆》敘述華人小學生魏牛和姐姐將每日零用錢節省下來救助祖國受難兒童的動人故事。

由於中國抗戰文藝形式的影響，新馬抗戰救亡文學也出現抗戰通俗民歌、新章回體小說、報告文學、文藝通訊、街頭劇、牆頭小說等文藝形式，其中有以閩粵方言、樂府民歌形式等創作的抗戰通俗歌謠，如訓飛的《抗戰山歌十二首》、黃嫻雲的《良姆教子》、李郎的客音童謠《月光光》、東方丙丁的《劉三姐過新年》等；也有以章回體形式創作的抗戰小說，如陳南的《老將報國記》、《金葉瓊思君》等。此外還有紫焰的報告文學《招牌的命運》、劉思的文藝通訊《C市》、葉尼的街頭劇《同心合力》等。其中訓飛的閩南語抗戰通俗民歌《十勸郎君》以妻子的口吻勸勉丈夫上前線奮勇殺敵：“一勸郎君你著聽，/當兵只路你著行，/去到戰場著拼命，/不可投降敗了名！”^②另一首《十勸娘仔》則以丈夫的口吻勸勉妻子為打擊日本侵略者而在後方努力生產：“第五勸娘心免寒，/著學前朝花木蘭，/後方努力加生產，/打倒日本有何難！”^③

在中國抗戰文藝運動的影響下，新馬抗戰救亡文學充分發揮了文學宣傳抗戰和教育民眾的作用，同時促進了自身的發展與興盛，並於1937~1942年創造了新馬華文文學史上的第二個創作高峰期。

（二）中國抗戰文藝運動對泰國華文文學的影響

在泰華文化界，1937~1938年是泰華報刊齊心合力共同宣傳抗戰的時期，也是泰華作者最多的時期。泰華作者傾力寫作“抗戰文學”，推動了泰華抗戰救亡文學的興起。

這時期的泰華文壇發生過幾次激烈的文藝論爭，而這與中國文藝思潮和抗戰文藝運動的影響有關。如有關泰華文學應該是“國防文學”還是“大眾文學”的論爭，持第一種觀點者主張泰華文學應該歌頌“抗戰救國”，寫“救亡運動”的東西，持第二種觀點者則大力倡導反映“此時此地大眾的生活”。此外還有關於“漢字拉丁化”的論戰，其論爭結果引起泰華文學作者對“通俗方言”寫作的重視。這些論爭促進了泰華抗戰文學的發展，出現了許多反映中國人民抗擊日寇和泰國華人支援中國抗戰救亡的詩歌、戲劇等作品。^④

在泰華抗戰救亡文學中，新詩是很重要的一環。泰華抗戰詩歌表達了作者們對中國的深情熱愛、對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對民族自由解放的追求等複雜情感。如秋冰的《鄉訊》控訴日本的侵華戰火破壞了中國人民安寧的鄉居生活：“烽火中歸來的田野/燒焦了欣榮的穀實/怨艾悲嗟，揉碎了/牧童牛背的閒適/悲苦的歲月/雕深了農夫額上的皺紋……”，劍倫的《奴隸的怒吼》鼓勵人們不憚流血犧牲，勇敢追求民族獨立與自由：“這時代/誰還害怕猙獰的屠客/誰還害怕犀利的刺刀/誰便是千世萬代的牛馬/誰不怕流血、犧牲/誰便是最後必來的自由者/自由神是跟在黑暗的後面……”。^⑤

泰華戲劇界也出現大量以宣傳抗戰救亡為內容的劇本，如鐵漢的《戰！》、俠魂的《為誰犧牲》、基鑾的《保衛大武漢》以及胡俊改編自中國女作家丁玲的同名作品《一顆未出膛的槍彈》等。泰華抗戰戲劇也受到中國抗戰文藝通俗化運動的影響，有的作品有意識地採用泰國華人喜聞

樂見的傳統藝術形式，如黛眉的獨幕小歌劇《一片愛國心》吸收潮州地方戲曲的表演藝術，融入念白、唱曲等表演形式，這種以“舊瓶裝新酒”的形式在激發泰國華人的抗戰熱情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國街頭劇、活報劇等抗戰文藝新形式也對泰國救亡戲劇產生了影響，如慧輝的街頭劇《不如歸去》寫潮汕人亞新為了逃避日軍戰火而南下暹羅投奔表兄亞明，後在亞明的勸說下決心回國參軍保衛家鄉和親人；行腳僧的活報劇《不愧愛人》則改編自福建南安的新聞報告，將女性爭取婚姻自主與追求民族自由解放聯結在一起。²⁵

（三）中國抗戰文藝運動對緬甸華文文學的影響

“七七”蘆溝橋事變後，緬華文藝界抗日救亡聯合會、緬華救亡歌詠團、救亡宣傳工作團、緬華文化界協會等相繼成立，有力地推進了緬華抗戰救亡文藝的開展。

緬華文藝界為配合救亡工作的需要而創辦了各種宣傳抗戰救亡的報刊，如《文藝》週刊、《卜間》、《晦鳴週刊》、《新知週刊》等。《新知週刊》的主編張華夫、編輯黃雨秋均為中國南下文人，其中張華夫原名張光年，即中國著名音樂家光未然，《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新知週刊》是一本注重時事性和文化綜合性的刊物，其形式和內容都仿照中國著名刊物《生活週刊》，它打著南洋愛國僑領陳嘉庚的旗號，還得到中國抗戰將領馮玉祥將軍的熱心支持及其惠賜的雅俗共賞的“丘八詩”。畢朔望每期為該刊撰寫國際時事述評，黃雨秋則多次用化名發表華北遊擊區記事，張光年除用化名寫雜文，還以光未然筆名連載《文學講座》。²⁶《新知週刊》是一個鋒芒銳利的突擊性刊物，在抗戰高潮時期對緬甸華人產生很大的影響。

由於中國抗戰文藝運動的影響，緬華文藝界也利用舊體詩詞、民間歌謠等文藝形式進行抗戰宣傳，如以《滿江紅》譜曲的抗戰歌曲、以閩粵方言創作的抗戰歌謠等，其中以福建閩南語創作的抗戰歌謠寫道：“日本起戰爭，中國開大槍，大槍一嚇開，日本死成堆。”緬華文藝界還通過歌詠活動等形式宣傳抗戰救亡意識，如中國南下仰光的女歌唱家林亭玉（字心）創作的歌曲，緬華作者吳曲夫（章彬）創作的《我們是中國好兒童》，黃綽卿根據中國電影《桃李劫》中聶耳的《畢業歌》改寫的《僑胞們》等。²⁷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張光年、趙淪、李凌等人領導緬甸華僑青年戰時工作隊（簡稱“戰工隊”）在曼德勒上演《黃河大合唱》。《黃河大合唱》以其磅礴的氣勢、充滿革命激情的歌詞和雄壯優美的曲調而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曼德勒，而且對戰後緬甸華僑愛國歌詠運動的廣泛開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和推動作用”。²⁸

（四）中國抗戰文藝運動對菲律賓華文文學的影響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菲華報刊《前驅日報》、《公理報》、《救亡月刊》、《菲島華工》等積極投入抗戰救亡宣傳活動，其中菲律賓華僑總工會出版的《菲島華工》就是為了宣傳抗日救亡而創辦的載有文藝作品的刊物。²⁹

在中國抗戰文藝運動的影響下，菲華戲劇團體“嚶鳴社”、“八·一三劇團”、“前進”、“國防劇社”等積極投入抗戰救亡的宣傳工作。這些劇團幾乎每天都有抗戰宣傳演出活動，而且寫報告文學，鼓勵華僑民眾獻捐、義賣等。³⁰國防劇社排演的劇目以宣傳愛國抗戰的內容為主，有《中國婦女》、《趙老太太》、《流寇隊長》、《東北義勇軍》、《八百壯士》等。³¹“學救會”話劇部深入街頭和鄉村開展戲劇和歌詠活動，向華僑民眾進行抗戰宣傳，其演出的劇目也有根據當時的新聞編寫的，如快報劇《台兒莊大捷》，但大部分劇目都來自中國作家的創作。

1939年，“福建省政府南洋華僑慰問團”到東南亞慰問僑胞，隨團的葉綿綿留在菲律賓和

當地劇團一起參加抗戰宣傳演出活動，並導演了吳祖光的《鳳凰城》。同年，“福建省藝術慰問團”到菲律賓宣慰僑胞演出，團員陳霖生、葉克也留在菲律賓從事話劇演出工作。1941年前後，中國作家邢光祖、林林、杜埃等南下菲律賓，將中國抗戰文藝運動的思想和作品廣泛介紹給當地民眾。杜埃受邀為菲律賓文藝界做過幾次關於抗戰文藝的報告，報告會還在菲華報章《華僑商報》、《建國週報》刊發了消息。^③

另一方面，菲華作者施穎洲的新詩《海外的賣報童》發表在巴金主編的《烽火》，詩歌描寫海外賣報童把中國抗日軍隊的捷報散播給海外僑胞，並將賣報所得捐助中國抗戰事業的行為，反映了包括菲律賓華人在內的海外僑胞的抗戰熱情和援助行動。

結語

綜上可見，可以說，沒有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與抗戰文藝運動的傳播和影響，就沒有1919年以來的東南亞華文新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因為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文學/文化不能在單一和孤立的環境中獲得良性的發展，它需要外來文學/文化的刺激、滲透、滋養、啟迪和影響，由此創造出更為豐富、更為優秀和更具色彩的民族文學/文化，而中國現代文化/文藝運動在東南亞的跨國傳播和影響，顯示出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漢語/華文文學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東南亞華文文學在汲取“中國文學傳統”的有益滋養後，也正在逐漸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學傳統”。有鑒於此，周策縱教授在“總結辭”中闡明了“雙重傳統”對於東南亞華文文學發展的重要性，他說：“東南亞華文文學今後一定會溶合這‘中國文學傳統’和‘本土文學傳統’而發展，即使在個別實例上可能有不同的偏重，但不能有偏廢。”^④因此，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傳統”今後仍將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產生持續而深刻的影響。

①③[美]周策縱：“總結辭”，載[新]王潤華、[德]白豪士主編：《東南亞華文文學》，新加坡：Goethe-Institut Singapore and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989年，第359頁。

②方修：《馬華新文學大系·理論批評一集》，香港世界出版社、馬來西亞大眾書局，1972年初版，2000年再版，第7~8頁。

③冷笑：《編輯刺語》，馬來西亞：《益群報》，1919年5月12日。

④《本部啟事》，新加坡：《國民日報》副刊《國民俱樂部》，1919年6月5日。

⑤《新國民宣言》，新加坡：《國民日報》副刊《新國民》，1919年6月20日。

⑥赤光：《小詩十首》，新加坡：《新國民日報》副刊《新國民雜誌》，1923年8月9日。

⑦秋毫：《南洋勵志歌》，新加坡：《叻報》副刊《文藝欄》，1922年6月27日。

⑧參見[泰]巴爾：《泰華文學的發展與中國文學的關

係》，載[新]王潤華、[德]白豪士主編：《東南亞華文文學》，第153~154頁。

⑨參見鄭祥鵬編：《黃綽卿詩文選》，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0年，第433~434、II、765~766、390頁。

⑩趙振祥等：《菲律賓華文報史稿》，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第78頁。

⑪[菲]施穎洲：《四十年間——〈菲華短篇小說選及散文選〉代序》，中華文藝月刊社，1977年，轉引自陳賢茂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第3卷，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年，第2~3頁。

⑫參見陳賢茂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第3卷，第3頁。

⑬參見賴伯疆：《海外華文文學概觀》，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119頁；莊鍾慶主編：《東南亞華文新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第414頁。

⑭參見犁青：《艱苦成長中的印尼華文文學》，

載[新]王潤華、[德]白豪士主編：《東南亞華文文學》，第90頁。

⑮M. N. (馬寧)：《英屬馬來亞的藝術界》，《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⑯楊贊：《給談戀愛的青年》，馬來西亞：《南洋時報》副刊《喇叭》，1928年1月4日。

⑰⑱參見鄭祥鵬編：《黃緯卿詩文選》，第231～233、261～262、419、465～468、476～478頁；第245、271～272頁。

⑲陳賢茂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第2卷，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年，第314頁。

⑳參見黑嬰：《漂流異國的女性》，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25頁。

㉑譚庭裕：《抗戰時期南洋文藝運動》，新加坡：《南洋週刊》，1938年第9期。

㉒訓飛：《十勸郎君》，新加坡：《南洋週刊》，第18期，1938年11月7日。

㉓訓飛：《十勸娘仔》，新加坡：《南洋週刊》，第21期，1938年11月28日。

㉔參見陳春陸、[泰]陳小民編寫，[泰]陳陸留校閱：《泰國華文文學史料》（上），汕頭：《華文文學》，1988年第2期。

㉕秋冰：《鄉訊》，劍倫：《奴隸的怒吼》，轉引自陳賢茂主編：《海外華文文學史》，第2卷，第315～316頁。

㉖㉗參見周寧主編：《東南亞華語戲劇史》（上、下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3、139、143～144頁；第882頁。

㉘㉙張光年：《從伊江到怒江——緬甸華僑戰工隊撤退歸國歷險記》，載林清風、張平編著：《緬華社會研究》，第4輯，澳門：澳門緬華互助會，2007年，第85頁；第70、86頁。

㉚賴伯疆：《海外華文文學概觀》，第102頁。

㉛參見[菲]王禮溥：《菲華文藝六十年》，Edsa, Quezon City M. M.：菲華藝文聯合會，1989年，第209頁。

㉜參見饒芑子主編：《中國文學在東南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01頁。

作者簡介：郭惠芬，廈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博士。福建廈門 361005

[責任編輯 陳志雄]